

刘建武 著

从毛泽东 到江泽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轨迹

CONG MAOZEDONG DAO JIANGZEMIN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LILUN DE XINGCHENG GUIJ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初步探索与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开始酝酿与基本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不断丰富与继续发展

湖南教育出版社

刘建武 著

从毛泽东 到江泽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演进轨迹

CONG MAOZEDONG HUI JIATIZHEN
ZHONGGUO TSE SHEHUTIZHENG LILUN DE XINJIENG GUIJI

藏书章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轨迹 / 刘建武著 .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I . 毛 … II . 刘 … III . 江泽民 - 中国特色 - 社会主义理论 IV .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4558 号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轨迹

作 者：刘建武

责任编辑：龙育群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大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32 开 印张：14.875 字数：350 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5355-4047-3/G·4042

定 价：26.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 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与理论成果	1
一、中共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初步探索与主要成果	5
二、“大跃进”前后的曲折探索与理论思考.....	38
三、“调整时期”的调查研究与认识成果.....	75
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与深刻教训 ...	102

中 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始酝酿

与基本形成	123
一、十年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萌芽的 孕育.....	124
二、全面整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 前奏.....	143
三、拨乱反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 提出.....	155
四、全面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 形成.....	183
五、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确立.....	212

下 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 与继续发展	243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理论的 新发展	248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理论的 新发展	288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理论的 新发展	352
四、	中国共产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党建理论 的新发展	388
五、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党的指导思想的 新发展	425
	后 记	469

上 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初步探索与理论成果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全新课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但与所有制改造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模式和道路选择方面，由于缺乏经验和准备，基本上没有跳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袭用了苏联式的制度结构和发展战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苏联模式的印迹。

从所有制方面看，由于当时仍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前提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来理解社会主义的，而且，苏联建立的单一公有制形式及在战时和战后一段时间所表

现出来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人更直接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样式，因此，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关系，不能不对中国所有制改造的思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就曾说过我们要学苏联的话。当时，我们党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就是追求公有制及其提高和普及。事实上，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和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理论根源。因而，建立起来的新的所有制关系公有化程度过高，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实际，这给 1956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从经济体制上看，当时我们党也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将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苏联所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结果，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改造过程中，我们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广到了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之中，严重地忽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由此留下了许多的后遗症。从生产关系变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来看，当时过于注重生产关系的变革，误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生产关系越纯越好，造成了在生产关系的急促变革中，严重忽视此种变革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联系问题。与此同时，在政治体制上，形成了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和政企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等。这些问题也都一直影响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其缺陷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个时期的工作时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在他看来，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走自己的路。

从 1956 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 20 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努力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复杂的原因，这期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既取得了不少成就，积累了许多珍贵的经验，也走过了一段弯路，尤其是产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正是正反两个方面所积累的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最为重要和最为直接的依据和契机。

探索者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的艰辛之路。毛泽东曾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 S 形。”^②从 50 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 20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7 页。

^②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进步作家、记者斯诺时的谈话。

年间，我们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倒退、成功与失败的曲折道路，一条 S 形的道路。这种充满艰辛的曲折探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中共八大前后（从 1955 年底到 1957 年反右扩大化之前）的探索、“大跃进”前后（从 1957 年反右扩大化到 1960 年底）的探索、“调整时期”（从 1961 年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探索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探索。

一、中共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与主要成果

毛泽东等提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同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赫鲁晓夫着手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这些情况自然引起了以苏联为学习榜样的中国党的关注和沉思。如何正确认识苏联的经验，特别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所形成的历史经验，成为党的领导人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客观上来讲，这时也具有了进行这种思考的可能和条件，一方面，我们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开始积累了一点经验，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也有所暴露，逐渐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55年底敏锐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①，并于1955年底由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直接领导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听取情况汇报的活动。

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反映出来的一些带全局性的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在谈到学习外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对学苏联也不要迷信，也得具体分析，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① 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也明确提出了学习苏联应有所学有所不学的重要观点。这次调研活动为中共八大报告的起草和《论十大关系》的形成作了准备。

正在中国共产党人思考苏联模式的得失之时，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3月17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接着，又于3月19日和24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他强调说，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4月4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并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提出了“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命题和庄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

严使命。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继续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①。

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1955年底以来几个月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的引言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

^①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这一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的率先探索在党内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思想理论界也空前活跃起来。这对于人们解放思想，摆脱长期以来学习苏联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束缚有重要的意义，进一步推动了全党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为八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八大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精神的方案和设想。这次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全面的战略部署，标志着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在理论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中共八大以后，在进一步的探索中，不仅在经济关系方面进行了若干的调整，而且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有1800多人出席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是八大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可是，到1957年夏，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这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21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充满生气和创造精神的探索历程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从 1955 年底到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前这一阶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黄金时期，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成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生长点。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以及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并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毛泽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的。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这一论断不仅纠正了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长时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完全适合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既然存在矛盾，就需要人们去解决，旧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正是矛盾的存在和解决矛盾的循环往复，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7 页。

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同旧社会具有了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即这些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矛盾了，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又由于生产力是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最根本的动力，所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已经蕴含着社会主义制度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来完善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命题。无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供了哲学依据。

其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说：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我们经济落后，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有一个大发展。“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①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 八大虽然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词，但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已经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八大路线的基础与核心。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斯大林 30 年代肃反扩大化的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战略任务的转移。他说，当苏联的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者很少的时候，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经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人民已经要求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斯大林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以往那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犯错误的根源。八大以后，毛泽东又多次阐发这一观点，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并充满激情地向广大党员干部发出了这样的号召：“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0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9、771~772 页。

期不说，干它个 50 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 40 年，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①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人士座谈时，对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战争”一词换上了新的涵义，他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人与人开战，花了几十年的精力；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开战。”

再次，是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鉴于苏共 20 大所揭露的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以及国内出现的闹事现象，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这样，继《论十大关系》之后，毛泽东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1956 年 12 月 4 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本思想。他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

^① 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3 月 20 日）。